

# 元代山西的军事镇戍

瞿大风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军事镇戍经过一个不断演变的发展过程。在全面占领河东山西以后, 元统治者分别采用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与侍卫亲军诸部在山西地区展开镇戍。其间, 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与侍卫亲军等诸种军队经过各个时期的不同组合, 在河东山西的镇戍活动中分别发挥出各自作用。随着元朝统治的腐败削弱, 元统治者在山西地区的军事镇戍逐渐崩溃。

**关键词:** 元代; 山西; 河东; 镇戍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有元一代, 元统治者在山西地区基本上是采取以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交参并用, 互相牵制的军事部署。其中, 蒙古军与探马赤军在河东山西的征戍使命并不完全一致, 前者以博尔忽后裔驻扎留守闻喜东镇, 着重于从中原汉地的整体镇戍展开部署。后者在元初之时以按扎儿部的探马赤军作为镇戍山西地区的核心力量, 着眼于全面镇摄、控制整个河东山西的军事防务, 且在金亡之后一度散居民间。河东山西的汉军万户府担负着山西、陕西与四川的右路西向上展开征戍活动的主要职能。侍卫亲军则是平宋以后, 元统治者为了辅翼拱卫大都, 特别重视晋北地区的军事防务, 从而专门部署进行镇戍、屯田的武装力量。在天历之战中, 在元统治者大量调兵外出征戍, 山西地区的镇戍活动一度出现相当薄弱的特殊变化。元末之际, 地方军阀勤王入晋以后, 分别调动其所统领的军事力量入晋镇戍南北各地, 相互争夺统治地盘, 并在充分利用河东山西的军事力量, 给予北方红巾军以致命打击的同时, 还逐步控制住山西地区的军事力量。孛罗帖木儿的军事势力消亡以后, 扩廓帖木儿最终形成独霸一方的统治局面, 一直展开军事镇戍到元朝灭亡。

## 一

有元一代, 山西地区作为华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始终是元统治者进行征服与统治的战略要地。按照元统治者“达兵机之要, 审地理之宜”的战略布防, 河东山西以地近河洛的“据天下腹心”, 成为“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的镇戍之地。<sup>[1]</sup>

壬辰(1232), 蒙古军兵马都元帅, 博尔忽后裔塔察儿进入河南伐金之前, 已在大河南北“分置营幕”, 将蒙古军部署到河东地区。甲午(1234)春正月, 塔察儿在灭金之际又向蒙古汗廷提出“请亘大河南北, 东自曹、濮, 西抵秦陇, 分兵驻守, 镇中原, 遏宋寇”的镇戍建议。《元史·塔察儿传》同样提到, 塔察儿在灭金后, “分兵屯大河之上, 以遏宋兵”。<sup>[2]</sup>“大河之上”即为黄河以北, 晋南地区便在这个地域范围之内。

随后, 塔察儿便在闻喜东镇五里外的南山之下, 大筑周垣, “楼其四隅, 中堂壮丽”, 还在戟门之外掘

引涑水为限，遂使驻地形成一派凛然威武之气。后来，塔察儿以“宅相所忌”，“附镇而居”。[3] 闻喜之西濒临黄河，渡河便可抵达陕西，实为“燕秦冲要”，东镇则距闻喜县城有三十里之遥，作为镇戍重地可以控遏河南、川陕往来晋、燕之区。塔察儿所率大部“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虽然“万夫、千夫、百夫之长无廨城邑”，却“有统齐征发之政”。[4] 由此来看，他的主张得到蒙古汗廷的切实施行，并被委以重任，镇戍河洛的“天下腹心”之地。塔察儿还被封为“云中公”一衔，在闻喜县封有食邑。[5]

根据《山右石刻丛编》中的《忽神伯閤不花碑》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塔察儿后裔伯閤不花承袭父兄之职，被授予过蒙古军万户，佩带三珠虎符。至元三十年（1293），又以蒙古军镇戍湖广。元贞元年（1295）以后，“岁扈北幸”。大德六年（1302），授任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副都万户，“死后葬于解州闻喜”。延祐二年（1315），其子昔里伯吉承袭河南淮北蒙古军副都万户，统领“四府两翼”。这通碑铭没有提到伯閤不花在河东山西的任何事迹，却仅载到伯閤不花葬于解州闻喜及其子昔里伯吉袭任河南淮北蒙古军副都万户，统领“四府两翼”的情况。《山右石刻丛编》在这通碑铭中的按语提到，“四府两翼”是指四万户府，每万户府下各有左右翼。

不过，《山右石刻丛编》中的《八撒儿德政碑》明确提到，后至元年间，八撒儿以“先世奉诏”，驻扎平阳闻喜东镇，“袭爵为万户长”，“莅职二十余年”，麾下所隶“千夫长十有二翼”，执行“调遣更卒，常岁守备”的镇戍职能。当时，八撒儿统军严明整肃，节制军吏，“无繁役使之扰于畜牧”，致使“地限蒨茝无蹊人田之弊”，还有“移建廨宇”，“督筑镇北之堤”，消除水患的惠民德政，乃至“士类悦附”，称其军为“虎貔熊罴”之师。[6] 这些记载进一步说明塔察儿后代所率蒙古军镇戍闻喜的详细情况。当时，闻喜还驻扎有蒙古军的其它军种。克呼的父亲云都世为砲手军千户，屯驻河东闻喜之西，其子孙后代就定居在此。[7]

综而观之，闻喜东镇一直是驻军镇戍河东山西的蒙古军万户府所在地，伯閤不花在大德六年（1302）被授予过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副都万户，“死后葬于解州闻喜”说明他一度镇戍过解州闻喜。若从上述碑中所载伯閤不花的军衔“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副都万户”、昔里伯吉的军衔“昭武大将军河南淮北蒙古军副都万户”来看，他们所率蒙古军当属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八撒儿的军衔“昭勇大将军河南淮北蒙古军万户”，统领管辖的是隶属河南淮北蒙古军四万户中的八撒儿万户。这便反映出镇戍河东山西的蒙古军后来改隶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的管辖之下，一直戍守到至正年间。

元初之时，还有部分蒙古军在河东山西的重要城镇中驻军镇戍。塔海帖木儿，答答里带人，在元太祖时从国王木华黎，率领左手大万户下蒙古军，“镇太原以西八州”。札刺台人忒木台领兀鲁、忙兀、亦怯烈、弘吉剌、札刺儿五部军，“驻兵太原、平阳”。[8] 杰烈率领亲信士卒一百二十人镇戍太原。[9] 有的县份之中还设管领蒙古军马的奥鲁之官，这便表明此类别县份中有蒙古驻军。[10] 不过，这些蒙古军的隶属关系在史料中并不明确，有待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

木华黎征服金朝是以探马赤军充当先锋的。但在征服中原之后，大部分蒙古军因习惯于北方草原的游牧生活，不愿留居戍守汉地。所以，他们返回漠北故地，将中原汉地留给探马赤军驻守镇戍。[11]

灭金之后，窝阔台汗诏命探马赤军五部将领分镇中原，“随处镇守”，并在抄籍汉民七十二万户以后，诏封灭金有功之臣，以三千户赐给探马赤军的五部将领。[12] 其中，按扎儿受封平阳户六百一十四，驱户三十，猎户四，升为千户[13]，作为他在征服与统治河东山西过程中所立汗马之劳的封赏嘉奖。同时，窝阔台汗依旧遵循成吉思汗的既定制度，继续赋予按扎儿的探马赤军驻扎平阳、太原等地的镇守重任。

从平阳、太原均属河东山西的腹心要地来看，成吉思汗与窝阔台汗将按扎儿部的探马赤军作为蒙古汗廷驻扎山西地区的核心力量镇戍在此，雄视河东，是着眼于使其全面镇摄、控制整个山西地区的军事防务。这样，不仅可对汉军与河东附蒙地方武装的守备治理进行控制，而且还能统领督促他们强化蒙古汗廷对山西各地的军事统治，严密防范任何可能的反抗活动。

不过，按扎儿部探马赤军的人数不多，难以满足全面镇守与统辖河东山西的军力需要。金亡之后，探

马赤军一度散居民间，分散驻守镇戍中原，且在中统年间曾被忽必烈集结起来重组成为侍卫亲军。至大三年(1310)春正月，元武宗令枢密院遣人将诸王阿只吉、火郎撒及迤南探马赤者“参定为籍”。至大四年(1311)，河东、陕西等北方各地“诸翼卫探马赤争草地讼者”就有二百余处。<sup>[14]</sup>这些探马赤军随地牧守，一有风吹草动，飞马驰报应属情理中事。

## 二

在征服与占领山西地区之初，蒙古汗廷逐步将外来汉军诸部将领由北向南地部署到西京、忻州、太原、隰州、平阳、绛州与河中等地，委任他们镇守这些战略重镇，发挥他们在军事占领和政治统治中的骨干作用。其后，外来汉军诸部将领在河东山西逐渐变成汉人世侯，一度成为大蒙古国全面统治山西地区的军政代表。汉人世侯则是地方武装附蒙以后，被蒙古汗廷赋予执掌军政权力，世袭守土辖地治理，进行统治中原汉地的特殊产物。在征服与统治山西地区的过程之中，蒙古统治者还逐步将河东山西的地方武装编入汉军，最终形成汉军诸部的组成部分，进而被投入到右路西向的对外征戍之中。

根据大蒙古国先降附者的地位高于后降附者的传统惯例，山西地区附蒙地方武装首领的社会地位起初低于外来征服河东山西的汉军将领。随着大蒙古国逐渐实现对山西地区的全面占领与强化统治，这些附蒙地方武装首领在竭力完成各种义务的必要条件下，且与外来汉军诸部将领融为一体，社会地位逐步上升，遵照大蒙古国实行地方军政长官的世袭制度，“论功行赏，分土世守”，成为大蒙古国统治山西各地的“诸侯”、“世侯”、“州郡长吏”<sup>[15]</sup>、“汉人世侯”或“汉军世家”。

在山西地区，蒙古统治者还设置过汉军军府统辖汉军诸部的军事行动。灭金之前，山西地区的汉军万户设在太原、平阳等处。陈顥原仕金为谋克监军，降附元太祖，授任平平等路军民都元帅。<sup>[16]</sup>任德忠率领族党降附蒙古军，充任镇抚军民都总帅，赐带银符，管领平阳。<sup>[17]</sup>陈顥与任德忠二人似任当时平阳路的军事长官。庚寅（1230）十月，窝阔台汗南征中原，经过灵石，命令程荣担任元帅，“掌领太原路军兵，监修桥道”。甲午（1234）秋七月，程荣“重受皇宣，特委提控平阳、太原两路桥道”。<sup>[18]</sup>

河中地区在蒙古汗廷驻军镇戍，强化统治的同时，依照进征需要组建起河东山西的船桥部队与征行万户等军事机构。乙巳（1245），河中地区军政机构官员包括：镇抚军民都弹压智全，省差河东南路船桥都水监使赵仪，宣差河南北路船桥都总管府谢坚；河中府判官高吉，同知谢天吉，知府陈宝；宣差总管夹谷义，宣差万户奥屯大哥（世英），宣差河中府随路军马都总管扎古得<sup>[19]</sup>，扎古得即张万家奴之父札古带。根据《元史·张万家奴传》记载，札古带起初服侍拖雷于潜邸，以“从破金有功，赐虎符，授河南北路船桥随路兵马都总管万户”，此职疑为河东山西船桥部队的最高指挥官。<sup>[20]</sup>

灭金之初，郭镐旅寓河中逗留，曾为征行万户奥屯公知遇起用。这个奥屯公指的就是奥屯世英，所率万户显然具有向外扩张的征行职能。奥屯世英，字伯豪，小字大哥，其先居上京胡里改路，后移薄城。丁亥（1227），奥屯世英以金征行都统领，率众归附。成吉思汗赐以虎符，俾隶朵火鲁虎彻立必麾下效命，“名在四大王府”，这个“四大王府”即为拖雷王府。庚寅（1230），蒙古军复下陕西，奥屯世英与札古带偕至富平（今陕西省富平县）。既平凤翔，击五峰山，又破凤州，取武休关，至兴元（今陕西省汉中），攻西和（今陕西省韩城），又攻巩州（今甘肃省陇西县），再入宋境。后从拖雷大军由兴元历金洋州，复徇唐（今河南省方城县）、邓（今河南省邓州），攻拔钧（今河南省禹州）、许（今河南省许昌），“麇（战）三峰山下”，大破金军。及奉上命镇守河中，招收天和、人和二堡。辛丑（1241），河中船桥官谢氏以事诬告奥屯世英，讼于有司。为此，奥屯世英被夺虎符，后经唐妃有言于上，复掌虎符，且以皇兄蒙哥大王亲草懿旨，称谓奥屯世英有功之故，所获成吉思汗所赐虎符，不可夺也，因而仍授万户之职。<sup>[21]</sup>奥屯世英奉命镇守河中府时，已经“改属别部”。其间，拖雷已经故去数年，以致窝阔台汗将奥屯世英与札古带改隶

刘黑马麾下统领，成为刘黑马所统汉军中的两个万户。

灭金之初，郭镐旅寓河中逗留，便为征行万户奥屯公知遇起用。<sup>[21]</sup>这个奥屯公指的就是奥屯世英，所率万户显然具有向外扩张的征行职能，由此可知，蒙古汗廷除在河中府专设船桥民政机构“省差河东南路船桥都水监”与“河中府镇抚军民都弹压”强化统治以外，还特别重视在河中府组建征行万户与船桥部队等军事出征作战机构。

灭金之后，蒙古统治者在派遣山西地区的大批汉军向外征戍的同时，还将部分汉军留守河东山西。山西地区的汉军诸部被扩充、组建过一些地方性的万户府，各路均有军事长官。庚子（1240）夏五月，九原府主帅郝和尚拔都朝觐窝阔台汗于行宫，被窝阔台汗授以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五路万户，易金虎符。辛丑（1241），刘黑马以汉军第一万户被蒙古汗廷改授担任都总管万户，“统西京、河东、陕西诸军万户”，夹谷忙古歹、田雄等并听节制。丁未（1247）九月，梁瑛受诏“充西京、平阳、太原、京兆、延安五路万户，治太原”。<sup>[22]</sup>

元宪宗在潜邸时，曾置河解万户府，领河、解二州。<sup>[23]</sup>辛亥（1251），元宪宗即位以后，议定官制。随后，山西地区“州郡武职多见易置”。<sup>[24]</sup>这个河解万户府则行使职能到至元年间。根据《山右石刻丛编》中的《月公普教寺二疏》记载，至元三年（1266）正月，河解万户管民官，宣差河解达鲁花赤，宣差河中府段绍隆，宣差河中府同知石抹雄飞，宣差河中府奥屯希恺均参加过“敦请月公长老住持十方普教寺为国焚修，祝延皇帝圣寿万安”的佛事活动。<sup>[25]</sup>此后，这个万户府便被罢废。郝和尚拔都的长子郝天益佩带金符，担任过太原路军民万户都总管。<sup>[26]</sup>阎镇起初承袭其父崞山军节度阎德刚担任州职，既而领兵千人，隶属“征西幕府”统领，这个“征西幕府”疑指在右路西向上的川陕等地展开征服的“河东陕西等处万户府”。其间，“凡万户长出师，则留摄军务于太原”，因以宣差明安（千户）之衔，悬带御前金牌，担任权太原路万户。<sup>[27]</sup>这个阎镇“留摄军务”似为行使太原路汉军的奥鲁与镇戍的双重职能。

其间，山西地区还有不少来自各县的中下层军官。《忻州志》载：李元通，以武功担任太原、平阳两路投下管领趁粮户都总管。李大中，担任太原路管军千户，赐银符。杨全，担任团练使千户。郑伯祥，担任百户。刘顺，担任百户。刘璋，担任百户。张瑛，担任百户。庞用，担任百户。潘仁德，担任百户。刘邦祐，担任百户。<sup>[28]</sup>

有元一代，河东山西汉军诸部的军事征戍主要根据元统治者的历朝定制，采取征服、镇戍并行划一的总体格局。元初之时，成吉思汗就是采取左、中、右三路对金朝领地展开全面进攻的。当时，术赤、察合台与窝阔台便大规模地率领右路军攻略过山西地区。蒙古军在占领山西地区以后，便将山西地区作为右路军展开军事行动的战略跳板，继续向着陕西、四川以右路向西不断征进，并在占领这些地区之后进行镇戍。这种始自蒙古大汗采用的征戍格局与划分统领的固定模式具有着持久、强大的影响力，成为黄金家族习以为常，奉行不悖的既定制度。

元统治者采用的这种征戍格局，还明显地从山西地区汉军将领的军衔封授上体现出来。庚子（1240）夏五月，九原府主帅郝和尚拔都朝觐窝阔台汗于行宫，被窝阔台汗进拜为宣德、西京、太原、平阳、延安五路万户，易佩金虎符。<sup>[29]</sup>辛丑（1241），刘黑马以汉军第一万户被蒙古汗廷改授为都总管万户，“统西京、河东、陕西诸军万户”，夹谷忙古歹、田雄等并听节制。<sup>[30]</sup>丁未（1247）九月，梁瑛受诏“充西京、平阳、太原、京兆、延安五路万户，治太原”。<sup>[31]</sup>河东陕西等处汉军万户府便担负着山西、陕西与四川的右路西向上展开征戍活动的主要职能。阎镇，起初承袭其父崞山军节度阎德刚担任州职，既而领兵千人，隶属“征西幕府”统领。“凡万户长出师，则留摄军务于太原”，并以宣差明安（千户）之衔，悬带御前金牌，担任权太原路万户。<sup>[27]</sup>这个阎镇“留摄军务”似为行使太原路奥鲁与镇戍的双重职能。

元朝时期，遵照大蒙古国的既定制度，元统治者继续将山西地区的各路汉军归属合并到河东陕西等处万户府的统领之下，在右路西向上展开行动。为了防御阿里不哥的背侧进攻，中统元年（1260）五月，忽

必烈诏命万户郑鼎、昔刺忙古率领平阳、京兆两路宣抚司所金军兵七千人，于延安等处守隘。为了对付阿里不哥的进攻，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还诏命过郑鼎统领征西诸军，戍守雁门关隘。[32]

忽必烈在削夺汉人将领的兵权以后，虽然遵照元初之时的既定制度，继续将山西地区的各路汉军归属到河东陕西等处万户府的统领之下，在右路方向上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却将河东山西各万户府的汉军奥鲁留守驻扎山西地区，且不随军行动。元代中期，大同就有河东万户驻军留守。泰定元年（1324），大同城外的兴云桥就是河东万户（图绵）连率“达诸朝，得给钱，市材役民”，采石修成的。[33]

元统治者还将山西地区各万户府的汉军奥鲁驻扎留守在河东山西，且不随军行动。至元五年（1268）七月，元廷罢各路奥鲁官，令管民官兼领。至元九年（1272）十二月，元廷诏诸路府州司县达鲁花赤、管民长官兼管诸军奥鲁。[34]由此，山西地区诸路府州县的长贰之官均兼诸军奥鲁之职。至元十四年（1277），平阳路总管兼府尹乌提兼管诸军奥鲁。至元十六年（1279），河中府知府移刺德裕兼管本府诸军奥鲁。至元十七年（1280），壶关县县尹与达鲁花赤均兼管诸军奥鲁。至元二十一年（1284），辽州知州吕名安答儿与达鲁花赤亦黑迷失不花均兼管诸军奥鲁。[35]至元二十八年（1291）夏四月，元廷诏各路府、州、司、县长次官兼管诸军奥鲁。[36]河东府州之中的判官、县中主簿遵照此令兼管诸军奥鲁。[37]元统治者采取这种前线部队与后方奥鲁分别区处的军事措施，有助于牢牢地控制把持山西地区的征戍军队，促使河东山西汉军诸部在外出征戍中更加有效的发挥作用。

中统、至元年间，元统治者在山西地区还交参并用过多种军队进行镇戍。中统元年（1260）十一月，忽必烈诏命汉军、质子军及签到民间诸投下军于西京、宣德屯驻。至元十六年（1279）八月，元廷还调动过江南新附军五千驻扎过太原。[38]

元统治者通常严禁汉人、南人、高丽人持有兵器，“汉人为军者不禁”。[39]但是，山西地区的镇戍汉军却以地临京畿，不行此令，甚至连有汉姓的达鲁花赤均被禁止持有兵器。至元二十四年（1287），河东山西道宣慰司呈报，“西京、太原、太和岭等处把隘军人，若将弓箭拘收，倘有疏失，不及申诉”。为此，尚书省札付枢密院依照呈报，拟定“所把隘口险恶，不时防送官物，合许执把闷棍，巡防勾当”。大德元年（1295），中书省河东陕西道奉使宣抚呈报，“太原路所辖州城有姓在闲达鲁花赤，多有执把弓箭之人，合行禁约”。为此，刑部议得：“有姓达鲁花赤如系汉儿人，拟合钦依禁约”，都省准拟照议施行。[40]这种状况清楚表明，元统治者对于河东山西各地汉军的驻守镇戍一直进行着相当严密的监督控制。

为了加强对河东陕西等处万户府的监督控制，元统治者在千户一级中设有达鲁花赤监临河东山西的汉军活动。《元史·速哥传》提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廷迁授速哥为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府达鲁花赤，后被请留未行。至元二十九年（1292），速哥入朝，加都元帅，改河东陕西等处万户府达鲁花赤。速哥之子寿不赤承袭河东陕西等处万户府达鲁花赤。《元史·武宗二》则载，至大三年（1310）十一月，以塔术为河东陕西等处万户府千户所达鲁花赤。[41]

### 三

在全国统一后，忽必烈进一步加强对侍卫亲军的组建与增设，在大都与上都附近地区“内立诸卫，屯田阅武，居重御轻”[42]，特别是“分置侍从亲军于畿甸，为诸卫所，以藩屏王室，张皇国威”[43]，作为保卫元廷的重要核心武装力量。

山西地区的“太原、大同皆与京师相表里，防维最重”。[44]因此，大同路则由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镇戍控制，担负着大都右路的军事防务。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大德十一年（1307），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增加军数，立为大同等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至大元年（1308）五月，改立大同

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以丞相赤因铁木儿为都指挥使。至大四年（1311），属徽政院。延祐元年（1314）十一月，改大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为中都威卫使司，仍隶徽政院，寻复改属枢密院。延祐七年（1320）六月，改红城中都威卫为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隶枢密院。

至治元年（1321），改为忠翊侍卫。后定置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金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二员，从七品；知事二员，照磨一员，俱从八品；令史七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镇抚二员。

行军千户所十翼，达鲁花赤十员，副达鲁花赤十员，千户十员，副千户十员，百户二百六员，弹压二十员。弩军千户所一翼，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十员，弹压十员。屯田左右手千户所二翼，达鲁花赤二员，千户二员，百户四十员，弹压四员。

对于侍卫亲军的将领任用，史卫民先生认为，这是“关系着朝廷安危，素为蒙古最高统治者所重视”，“受朝廷内部政治斗争的影响”的大事。<sup>[45]</sup>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任用便大抵如此，往往都是当朝皇帝特别重视与专门选用的亲信之人。在此，不妨试举若干例证加以说明。

忽必烈在即位之初对汉人军官较为信用，侍卫亲军中的都指挥使、副大多均由汉人充当。其中，石天应之子安琬承袭父职，佩金符，曾从忽必烈征服大理，讨伐李璫。至元年间，累功官至右卫亲军副都指挥使，进阶怀远大将军，赐金虎符，后授大同等处万户，领江左新附卒万人，屯田红城。其后，安琬之子石居谦又袭父职担任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sup>[46]</sup>

至治元年（1321）二月，元英宗改中都威卫为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以铁失为御史大夫，佩金符，领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元英宗即位之初，铁失不过官任翰林学士承旨、宣徽院使、太医院使。时未逾月，元英宗特命铁失领中都威卫指挥使。至治改元，铁失还得到过元英宗所赐珍珠燕服。三月，特授光禄大夫、御史大夫，仍金虎符、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依前太医院使。明年十二月，铁失以御史大夫、忠翊亲军都指挥使、左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太医院使，兼领广惠司事。<sup>[47]</sup>铁失虽然深受元英宗的器重与信任，但却不思报效，乃至叛逆弑杀元英宗，最终导致悲惨结局。

大德三年（1299），伯颜随从海山征讨海都。伯颜，蔑儿吉台氏，曾侍皇侄海山于藩邸。大德十一年（1307），海山赐号伯颜拔都儿。海山即位以后，伯颜官拜吏部尚书，俄改尚服院使，又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1309）十一月，伯颜担任尚书平章政事，特赐蛟龙虎符，领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天历元年（1328）九月，元文宗以元武宗海山次子即位执政。十一月，伯颜作为海山亲信旧臣兼任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天历二年（1329）正月，伯颜官拜太保。二月，授储庆使，加赐虎符，特授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至顺二年（1331），元顺帝曾给元末名臣脱脱授过虎符，命任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sup>[48]</sup>至顺三年（1332）十月，元顺帝还提拔过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伯撒里为同知徽政使。这个伯撒里作为元末“累朝旧臣”，被元顺帝诏拜过太傅，并且担任右丞相。<sup>[49]</sup>上述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均为元朝时期的重要人物，因此不难说明元廷对于这一将领选用任命的重视程度。

平宋以后，忽必烈每年行幸上京，除将侍卫亲军“分其大半，以备扈从”，其余“留屯于营力田，以供储侍”<sup>[50]</sup>，减轻元廷的经济负担，以使“军食悉仰足焉”。<sup>[51]</sup>因此，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在大同路驻军镇戍，“藩屏王室”的同时，还担负着屯田耕种，以资军用的重要职能。

至元二十九年（1292），忠翊卫始立屯田府。当时，忽必烈命各万户府，摘大同、隆兴、太原、平阳等处军人四千名，于燕只哥赤斤地面及红城周围，置立屯田，开耕荒田二千顷，仍命西京宣慰司领其事。大德十一年（1307），改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仍领屯田，并放罢汉军返回红城，屯所只存民夫在屯。至大四年（1311），以大同黄华岭（即太和岭）新附屯田军一千人并归本卫，别立屯署。是年，改大同侍卫为中都威卫，分屯军二千置弩军翼，止以二千人分置左右手屯田千户所，黄华岭新附军屯如故。同时，因皇太后

修五台寺，遂移属徽政院，增入京兆军三千人。元仁宗时，改万户府为总管府，有户军四千二十，民五千九百四十五，田五千顷。延祐二年（1315），迁红城屯军于古北口、太平庄屯种。延祐五年（1318），复签中都威卫军八百人，于左都威卫所辖地内别立屯署。延祐七年（1320）十二月，罢左都威卫及太平庄、白草营等处屯田，复于红城周围立屯，仍属中都威卫。其间，元仁宗将万户府改为总管府。<sup>[52]</sup>至治元年（1321），始改忠翊侍卫，由枢密院所辖，屯田大同之雁门、平地、朔州之马邑。<sup>[53]</sup>

腹里所辖大同屯储府在大同、山阴县屯田，有九千九百人，田五千顷。<sup>[54]</sup>大德元年（1297），徙大同路军储所于红城。<sup>[55]</sup>大德四年（1300）二月，以黄华岭等处田土颇广，命立屯开耕，发军民九千余以滨河土沃屯田其地。<sup>[56]</sup>大德六年（1302）十月，罢军储所，立屯储军民总管万户府专督其程，下属山阴、雁门、马邑、鄯阳、洪济、金城、宁武屯田七处。大德十年（1306）夏四月，太和岭的屯田之地以“旧置屯储总管府，专督其程。人给地五十亩，岁输粮三十石，或佗役不及耕作者，悉如数征之，人致重困”。<sup>[57]</sup>同时，还采取军官分别统领，以宣慰使玉龙失不花总领其事，视军民所收多寡以为赏罚。泰定元年（1324）三月，罢大同路黄华岭及崇庆屯田。至正十九（1359）二月，元廷又置大都督兵农司于西京，以孛罗帖木儿领之，从其所请，仍置分司十道，专掌屯种之事。<sup>[58]</sup>

此外，隆镇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在太和岭亦有屯田，且在太和岭设千户所，秩五品。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百户六员，弹压一员。于大同路昌邑县本隘置司。至大四年（1311），枢密院改千户所为万户府，分钦察、唐兀、贵赤、西域、左右阿速诸卫军三千人，并南、北口、太和岭旧隘汉军六百九十三人，屯驻东、西四十三处，立十千户所，置隆镇上万户府以统之。

## 四

元朝末期，山西地区的镇戍活动表现出与元初之时绝然不同的明显特征。这一时期，在元统治者大量调兵外出征戍与地方军阀勤王涌入的军事形势下，河东山西的镇戍活动不断发生重大变化。

在天历之战中，山西地区作为辅翼大都的战略要地，一度受到大都与上都两大阵营的互相争夺，这种相互争夺充分体现出河东山西在保卫大都，防御来自陕西与四川方面进攻时的重要作用。

天历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崩于上都，朝中权臣倒剌沙和乌伯都剌在上都，纠集辽王脱脱、梁王王禅，准备拥立泰定帝之子即位。当时，枢密院事燕铁木儿留守大都，实掌军权，以身受元武宗宠遇之恩，遂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等人密谋拥立元武宗之子。经过采取一系列的夺权步骤，燕铁木儿遣使驰驿江陵南接怀王图帖睦尔，北迎周王和世㻋。

根据军事形势的迫切需要，大都方面的燕铁木儿与元文宗图帖睦尔先后在山西地区实施过一番军事部署，极力保卫大都安全。八月，斡都蛮自上都逃来以后<sup>[59]</sup>，被燕帖木儿任为裨将，以指挥使将兵屯驻太和岭<sup>[60]</sup>，保卫大都右路一侧。同时，燕帖木儿又遣万户彻里帖木儿将兵屯驻河中。九月，立行枢密院于汴梁，以同知枢密院事也速台儿知行枢密院事，将兵巡视太行诸关，西行河中、潼关戍军，分发折叠弩给守关军士，并对冀宁、晋宁两路所辖代州之雁门关，崞州之阳武关，岚州之天涧口、皮库口，保德州之寨底、天桥、白羊三关，石州之坞堡口，汾州之向阳关，隰州之乌门关，吉州之马头、秦王岭二关，灵石县之阴地关等诸险之地，皆令穿堑垒石加固防御工事，调集丁壮进行拒守。十月，大都方面一面调动河南蒙古军，增守京师，一面以塔海充枢密佥院，戍守潼关及河中府。<sup>[61]</sup>

此外，大都方面还专门调动镇戍湖广的平阳、保定两军北上勤王，扼守要地，确保夺取政权获得成功。天历元年（1328），湖广行省军中唯有平阳、保定两个万户号称精锐之师。是年九月，元廷授郑昂霄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领平阳、保定两军，近黄河屯驻听调”，且与万户脱脱木儿统领所发斡、黄等三万守军，

沿着黄河布营扎寨，以备随时调遣征派。<sup>[62]</sup>继而，又授郑昂霄为行枢密院副使，率军“戍虎牢关，扼潼关，以御西军”。<sup>[63]</sup>所谓“西军”当指四川、陕西方面支持上都的军事力量。天历二年（1329），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起兵四川，对抗元文宗。为此，元文宗命镇西武靖王搠思班等调动军队，并以湖广行省官脱欢、别薛、孛罗及郑昂霄总领其兵进行讨伐。<sup>[64]</sup>

上都方面同样采取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全面夺取山西地区，以便打开东进大都的道路。天历元年（1328）九月，元文宗在枢密院事燕帖木儿统军拥戴、夺取政权之后，上都便立泰定帝之子为天顺帝，派兵分道东进大都。元文宗遣使颁诏抵达陕西，竟被陕西省、台之臣拘执送往上都。于是，陕西出兵西进，入河中府，劫行用库钞万八千锭，诛杀同知府事不伦秃。诸王忽剌台等支持上都方面，引兵进犯崞州，入紫荆关，意欲控制山西地区，进而与西线起兵的发难同党遥相呼应。

是月，陕西行台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引兵从大庆关渡河。由于山西地区的大量军队征戍在外，一时形成河东山西军事部署异常薄弱，无法在突发事件中形成足够的防御力量。河中达鲁花赤八扎海牙与知河中府靳克忠“走檄告急”，却仅得到“枢府调兵三千赴之”。其间，河东“荒歉之余”，“无所仰给”。二人“首捐家财，置备粮草，科集壮丁与官军并力守御”，以死相拒。坚守数月，官军将领“无死援之志，引兵宵遁”，遂使河中城破，二人被执，不屈死节。<sup>[65]</sup>河东各地风闻也先帖木儿率西军至，官吏皆弃城走，也先帖木儿悉以其党取而代之。十月，也先铁木儿军至晋宁，本路官员皆已远遁。

察罕脑儿（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的湘宁王八剌失里支持上都方面，向东引兵进入冀宁，杀掠吏民。汪古部赵王马扎罕承奉上都之命，亦起所部兵马南侵冀宁。当时，太行诸关守备皆阙，冀宁路来使告急，元文宗敕万户和尚将兵援助，并以冀宁路官府招募民丁迎敌抗御，和尚以兵殿后督战，杀获甚众。在上都方面军兵大批抵达之后，和尚退保故关，冀宁遂破。其间，河东山西几乎完全落入上都方面之手，大都方面危在旦夕，不可终日。

在天历之战中，山西地区的军队大多在外镇戍，按扎儿旧部的探马赤军早已重新组建成为侍卫亲军，即使大都方面的驻军数量亦是相当有限。倘若不是河东山西山险路隘，进军缓慢，燕帖木儿与其弟撒敦、其子唐其势等部队屡屡击败上都诸军，迅速展开有利的军事行动，以及齐王月鲁帖木儿、元帅不花帖木儿兵围上都，倒刺沙奉皇帝宝出降，上都方面右路诸军指日攻破大都，燕铁木儿与元文宗的人头落地，江山易主恐怕不是危言耸听的天方夜谈。

元末之际，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两大地方军阀势力勤王入晋之后，亦在山西地区展开激烈的相互争夺。元廷鉴于“察罕与孛罗常构兵争晋冀之地”，“以晋冀分属两家”，诏命孛罗帖木儿戍守石岭关以北地区，察罕帖木儿戍守石岭关以南地区，此关地处“忻、代、武、朔往来之要冲”<sup>[66]</sup>，从而为双方划出镇戍范围，以使分别控制河东山西。随后，察罕帖木儿以“用兵数年，惟藉冀、晋以给军而致盛强”<sup>[67]</sup>，不仅逐步完全控制住山西地区的军事力量，而且借口用兵汴梁，屯兵泽、潞。察罕帖木儿养子扩廓帖木儿则经过不断经营，最终形成独霸一方的镇戍局面。

在山西地区镇压红巾军的同时，察罕帖木儿还将其所统领的军事力量调入山西各地进行镇戍。至正十九年（1359），上蔡（今河南省汝南县）人叶企颜以统军元帅行翼城事，抚慰军民，以使无或失所，远近怀服。<sup>[68]</sup>至正二十二年（1362），广平（今河北省永年县）等处兵农宣慰使司都元帅吴公讳征讨红巾军进至武州。在兴县兵乱，侵及保德州时，吴公讳领军却之。<sup>[69]</sup>时公权，任吉、隰二州统兵官，先后采取“课士抚民、教养移俗、练兵御寇”的措施，且有“御寇炳七寨之功，以保障二郡之安”。<sup>[70]</sup>至正二十五年（1365），总兵官扩廓帖木儿委任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理问官王溥镇守祁县。<sup>[71]</sup>至正年间，蔚州（今河北省县）人韩浩提兵来守，授便宜都元帅兼应州彰国军节度使。<sup>[72]</sup>这些驻守山西各地的外来统军之将似多是在地方军阀察罕帖木儿进入山西地区之时，而被部署镇戍各地的。

至正二十二年（1362）六月，察罕帖木儿遇刺身亡。经由所部推举其养子扩廓帖木儿出任总兵之官以

后，元廷授予扩廓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东等处行枢密院事、同知詹事院事，袭领察罕帖木儿的职衔及其原班人马，成为地方军阀集团新的代表人物。孛罗帖木儿乘着察罕帖木儿死去，大肆向山西地区两侧的河北与陕西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同时还对晋南地区进行包抄。八月，孛罗帖木儿、张良弼“据延安，掠黄河上下，欲东渡以夺晋宁”。<sup>[73]</sup>

至正二十三年（1363）三月，元廷诏命中书平章政事爱不花分省冀宁，重新正式向山西地区派出行政官员。当时，扩廓帖木儿依旧派军驻扎在太原地区，牢牢地把持着太原地区的军政权力不肯放弃，致使“冀宁分省遂罢”。<sup>[74]</sup>冬十月，孛罗帖木儿再次用兵进攻冀宁，被扩廓帖木儿大败其军。其后，扩廓帖木儿兵驻太原，重新与驻扎大同的孛罗帖木儿各守其地，以势相持。孛罗帖木儿的军事势力消亡之后，扩廓帖木儿最终彻底控制住山西地区，一直进行军事镇戍到元朝崩溃。<sup>[75]</sup>

### 参考文献

- [1] 元史[M]. 卷九十九,《兵志二》.
- [2] 元史[M]. 卷一百一十九,《博尔忽传》.
- [3]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三十四,《洞霞观记》.
- [4] 姚燧. 牧庵集[M]. 四部丛刊, 卷十五,《千户所听壁记》.
- [5] 闻喜县志[M]. 民国八年石印本, 卷二,《沿革》.
- [6]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三十七,《忽神伯阁不花碑》; 卷三十四,《八撒儿德政碑》.
- [7] 程钜夫. 雪楼集[M]. 卷二十一,《故砲手军总管克噶神道碑》.
- [8] 元史[M]. 卷一百三十五,《塔海帖木儿传》; 卷一百三十一,《奥鲁赤传》.
- [9] 虞集. 道园类稿[M]. 卷二十六,《僧家纳生祠记》.
- [10]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八,《芮王庙记》.
- [11] 杨志玖. 元代的探马赤军[A]. 元史三论[C]. 第12页; 瞿大风. 蒙元时期的探马赤军辨析[A]. 宋元辽金[C].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2000, (3).
- [12] 元史[M]. 卷一百二十二,《按扎儿传》; 卷一百二十三,《阔阔不花传》.
- [13] 虞集. 道园类稿[M]. 卷四十五,《蒙古拓拔公先莹碑》.
- [14] 元史[M]. 卷二十三,《武宗二》; 卷一百三十二,《拔都儿传》; 卷一百六十六,《石高山传》.
- [15] 元史[M]. 卷一百九十二,《良吏二》; 卷一百四十六,《耶律楚材传》.
- [16] 元史[M]. 卷一百七十七,《陈颢传》.
- [17] 闻喜县志[M]. 民国八年石印本, 卷十六,《名贤》.
- [18] 山西通志[M]. 卷九十六,《霍州经始公廨桥道碑》.
- [19] 山右石刻丛编[M]. 卷二十四,《谢坚请钦公疏》;《河中请钦公疏》;《扎古得请钦公疏》.
- [20] 元史[M]. 卷一百六十五,《张万家奴传》.
- [21] 李庭. 寓庵集[M]. 卷六,《陕蜀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郭公行状》; 卷七,《大元故宣差万户奥屯世英神道碑铭》.

- [22] (明)朱昱.嘉靖重修三原志[M].卷十,《忠定郝公神道碑铭》;元史[M].卷一百四十九,《刘伯林传》;山右石刻丛编[M].卷三十一,《梁瑛碑》.
- [23]元史[M].卷五十八,《地理一》.
- [24]山右石刻丛编[M].卷三十,《王氏世德碑》.
- [25]山右石刻丛编[M].卷二十五,《月公普教寺二疏》.
- [26]元史[M].卷一百五十,《郝和尚拔都传》.
- [27]山右石刻丛编[M].卷二十四,《朝元观记》.
- [28]忻州志[M].光绪六年本,卷三十一,《武阶》.
- [29] (明)朱昱.嘉靖重修三原志[M].卷十,《忠定郝公神道碑铭》.
- [30]元史[M].卷一百四十九,《刘伯林传》.
- [31]山右石刻丛编[M].卷三十一,《梁瑛碑》.
- [32]元史[M].卷四,《世祖一》;卷一百五十四,《郑鼎传》.
- [33]虞集.道园类稿[M].卷二十六,《兴云桥记》.
- [34]元史[M].卷七,《世祖四》.
- [35]山右石刻丛编[M].卷二十六,《重修女娲庙碑》,《河中府庙学碑》,《大觉院兴修记》,《辽州重修宣圣庙碑》.
- [36]元史[M].卷十六,《世祖十三》.
- [37]山右石刻丛编[M].卷二十八,《重修五龙庙》,《荀息庙碑》.
- [38]元史[M].卷九十九,《兵二》;卷十,《世祖七》.
- [39]元史[M].卷一百五,《刑法四》.
- [40]大元通制条格[M].卷二十七,《兵仗应给不应给》.
- [41]元史[M].卷一百三十一,《速哥传》;卷二十三,《武宗二》.
- [42]胡祇遹.紫山大全集[M].卷十一,《清慎堂记》.
- [43]析津志辑佚[M].第35页.
- [44]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M].第二册,卷三十九,《山西一》.
- [45]史卫民.元代军事史[M].第228页.
- [46]元史[M].卷一百四十九,《石天应传》.
- [47]元史[M].卷二十七,《英宗一》;卷二百七,《逆臣传》.
- [48]元史[M].卷一百三十八,《伯颜传》,《脱脱传》.
- [49]元史[M].卷一百四十,《太平传》;卷一百四十一,《察罕帖木儿传》.
- [50]析津志辑佚[M].第35页.
- [51]元文类[M].卷四十一,《杂著·屯田》.

- [52] 续文献通考 [M]. 卷四,《田赋四》.
- [53] 马邑县志 [M]. 民国七年铅印本, 卷一,《地理志》.
- [54] 元文类 [M]. 卷四十一,《杂著·屯田》.
- [55] 元史 [M]. 卷一百,《兵三》.
- [56] 大同府志 [M]. 乾隆四十七年刊本, 卷四,《山川》.
- [57] 续文献通考 [M]. 卷四,《田赋四》.
- [58] 元史 [M]. 卷九十二,《百官八》.
- [59] 元史 [M]. 卷一百二十三,《阿剌瓦而思传》.
- [60] 马邑县志 [M]. 民国七年铅印本, 卷一,《地理志》.
- [61] 元史 [M]. 卷三十二,《文宗一》; 卷一百二十二,《塔海传》.
- [62] 元史 [M]. 卷三十一,《明宗》.
- [63] 刘岳申. 申斋集 [M]. 卷九,《参知政事郑公墓志碑》.
- [64] 元史 [M]. 卷三十三,《文宗二》.
- [65] (明) 李侃, 胡谧纂修. 山西通志 [M]. 卷十五,《守节之碑》.
- [66] 永乐大典 [M]. 卷五千二百三,《太原府五》.
- [67] 元史 [M]. 卷四十五,《顺帝八》.
- [68] 翼城县志 [M]. 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卷二十四,《名宦》.
- [69] 保德州志 [M]. 康熙四十九年刊本, 卷六,《官师》.
- [70] 吉县志 [M]. 光绪五年铅印本, 卷三,《宦迹》.
- [71] 山右石刻丛编 [M]. 卷四十,《重修汤王庙记》.
- [72] (明) 田蕙纂辑, 王有荣校刊. 应州志 [M]. 卷四,《名宦》; 大同府志 [M]. 乾隆四十七年刊本, 卷十七,《宦迹》.
- [73] 元史 [M]. 卷四十六,《顺帝九》.
- [74] 元史 [M]. 卷九十二,《百官八》.
- [75] 瞿大风, 崔树华. 元末统治集团对山西地区的争夺及其作用 [J]. 蒙古学信息, 2002, (2).

## Military Garrison in Shanxi Region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Qu Dafeng

(Institute of Mongol Histor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Inner Mongolia, China)

**Abstract:** The military garrison of Shanxi Region went through continuous change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After

conquering and occupying Shanxi Region, the rulers of the Yuan Dynasty separately adopted Mongol Army, Tamaci Army, Han Troops and Standby guard Army to garrison there. At that time, Mongol Army, Tamaci Army, Han Troops and Standby guard Army respectively played their own parts by different composition. With the corrup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military garrison of Shanxi Region collapsed step by step.

**Key words:** Shanxi Region; Military Garrison

**收稿日期:** 2014-01-15;

**作者简介:** 瞿大风 (1954-), 男, 汉族, 浙江杭州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南开大学历史博士, 主要从事元史研究。